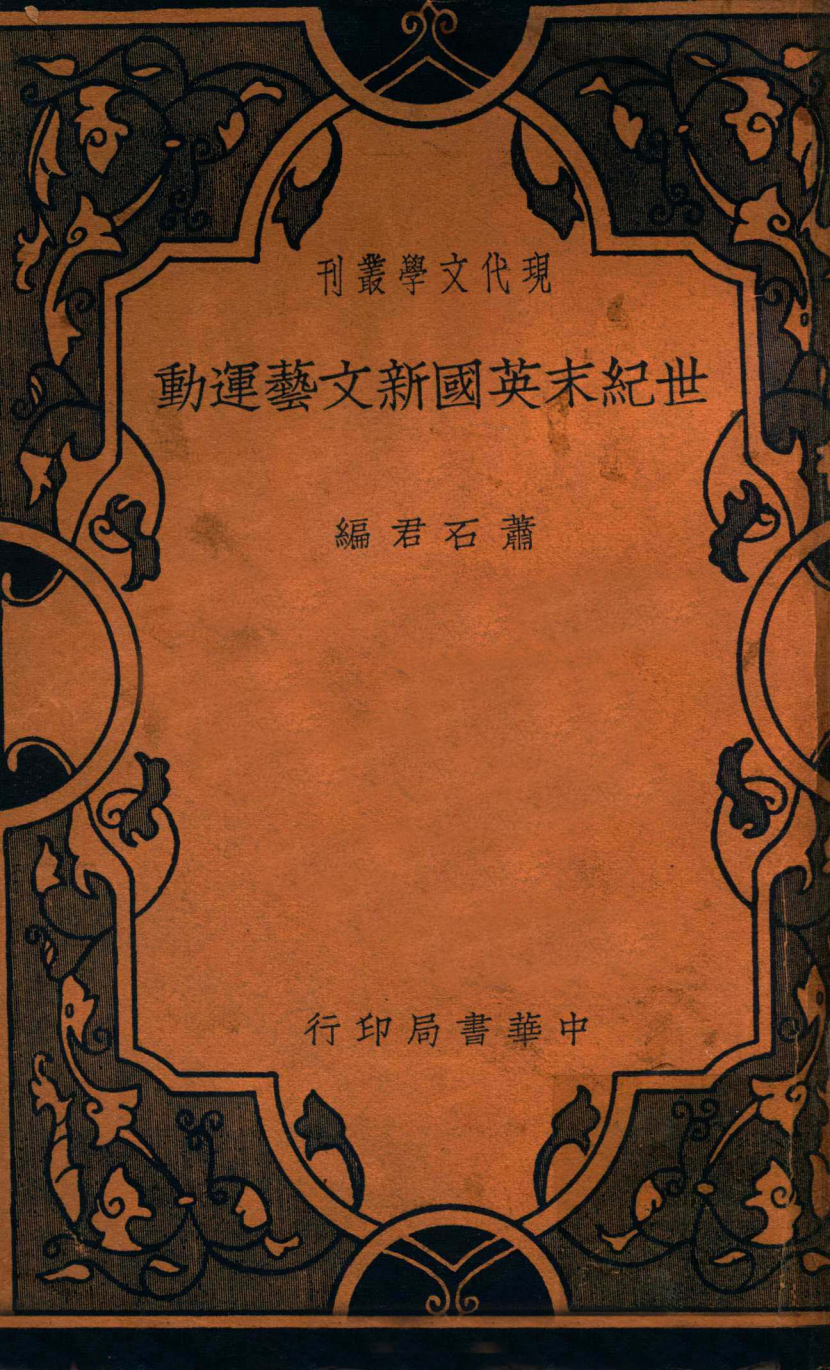




現代文學叢刊

世紀末英國新文藝運動

蕭石君編

中華書局印行

現 代 文 學 叢 刊

蕭石君編

世紀末英國新文藝運動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一二號
現代文學叢刊
世紀末英國新文藝運動（全一冊）

◎ 定價 銀 六 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者 蕭石君

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序言

往日編者讀世紀末英國文學，知道它受法國文學的影響極大。年來讀法國象徵派的作品，心中更多印證，遂着手編譯本書。英籍中啓發編者最多的是 George Moore: 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 Arthur Symonds: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三書而日人矢野崋人所著的近代英文學史亦常爲編者所借鏡。

世紀末英國文學有人說是青年人的文學，夢魘者的文學，這評語極爲編者所同意。至同意的理由則本書已替編者說明了。

一九三〇，九，六。石君記於巴黎郊外。

世紀末英國新文藝運動目錄

序言

緒論

第一章	裴德的哲學思想	一九
第二章	世紀末英國文壇概觀	三七
第三章	世紀末英國文學的特色	六五
第四章	狄卡耽的意義	八一
第五章	王爾德、昆阿、慈里及詩人俱樂部	一一一
第六章	賽孟慈與新文藝運動	一三一
第七章	新文藝運動的反響	一五一
第八章	葉慈與愛爾蘭文藝復興	一六九

世紀末英國新文藝運動

緒論

世紀末英國文學呈出歷史上未曾有的變動，在這時代所稱的新文學大都含有異國的(Alien)成分。這時代的作家却非無意識的盲目的向這方面進行，在某程度上大半是有意識的不謀而合的希望新文學的建設。一種事實發生常有主要思潮作它的背景，文學也是一樣，我們且看一看英國文學史上的主要潮流和它的蛻變的途徑。

大家知道構成西方文化的是希伯萊主義(Hebraism)和希臘主義(Hellenism)兩個成分。英國文學自然是從這兩大成分派生的一個支流。希臘主義注重意識的自由生發(Spontaneity of Consciousness)，他們歎賞形體的勻整遂產生彫刻，讚美心性的無限便有敘事詩和劇曲。希伯萊主義保持良心的謹嚴(Self-

ictness of Conscience) 他們對於創造萬有的神表示無限的崇敬，於是有聖經和抒情詩。前者注重智慧，後者注重道德。前者產生世間極燦爛的哲學，後者產生世間極虔誠的宗教。這兩大成分不消說根本是不同的。但是往後無論在某民族、某時代、某個人，這兩者往往有彼此會通、彼此蛻嬗的時候。比方羅馬教會便在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 的哲學中找神學的基礎。柏拉圖 (Plato) 所說的自強不息和基督教的淨化自己亦有相通之點。而史家所稱的發見自我的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祇是對於中世紀否定自我的宗教空氣所生的反動，換句話說，祇是希伯萊主義和希臘主義的蛻嬗。

在這裏，我們應當注意的乃是穆爾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柯列特 (John Colet 1467—1519) 等所倡導的英國的文藝復興。那時候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比起南歐的來，其中道德的成分仍佔優勢，這也可以看出英國的國民性從好的方面說，英國人心性健全，凡事注重躬行實踐，從壞的方面說，英國人頭腦頑鈍，不大能創造或容納靈活的思想。

英國最初的大詩人覺叟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雖亦受文藝復興的影響，然發見自我的色彩不甚濃厚，他的著作以描寫人情風物爲主。直到伊麗查伯 (Elizabeth 1533—1603) 后時代，在斯賓塞 (Edmund Spenser 1552—1599) 馬羅 (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 尤其在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的身上才收穫文藝復興的豐滿的果實。這三人的著作自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至於脫離一切束縛以滿足追求無限的自我的願望，在萬有中發見自我等，却是相同的。但是這種外延的離心的態度經過一個時期又不免發生反動。比方文藝復興後發生宗教改革 (Reformation)，便是內包的求心的態度的擡頭。在英國，文藝復興過後便有清教 (Puritanism) 時代。

清教徒 克林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深憤政府對於清教徒的迫害，統率武裝同志 (Roundheads) 將王黨 (Cavaliers) 擊破，殺斃國王查爾士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並逐其子於國外，這即是英國史上所稱的內戰 (The Civil War 1642—1649)。克林威爾執政時代清教成爲當時文學的特色，

他的拉丁文祕書彌爾敦 (John Milton 1608—1674) 的著作在這時代中有巨塔摩天之感。如果我們將莎士比亞喚做文藝復興的佳兒，我們也不妨喚彌爾敦爲宗教改革的佳兒，雖然彌爾敦的著作中也有不少的文藝復興的成分。

王政復興，查爾士二世即位，空氣爲之一變。查爾士二世個人既極圖歡樂，而一般人民對於清教的極端嚴肅的風尚亦致不滿，上行下效，當時英國的習俗頗近於荒淫。可是心性健全的英國人不致樂而忘返，他們將歷代積下來的常識哲學代替清教徒的熱烈的理想，事事講條理，講法則，力戒奔放不羈以免有背於中庸之道，在文學上則產生了擬古典主義 (Pseudo-Classicism)。就詩壇論，杜萊敦 (John Dryden 1631—1700) 和頗蒲 (Alexander Pope 1688—1744) 二人可算這時代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詩都側重技巧，缺乏深思和熱情。如果將這時代的文學和前兩個時代的文學比較，莎士比亞時代的文學是熱情的文學，追求美與歡樂的文學；彌爾敦時代的文學是意志與信仰的文學；這時代的文學乃是理智、教訓和譏諷的文學。

十八世紀後半期已有人對於擬古典主義表示不滿，例如瓦爾敦（Joseph Warton 1722—1800）在他的論頗蒲於天才和著述（Essay on the Genius and Writing of Pope）中即發『頗蒲是一個詩人嗎？』（Is Pope a poet?）的疑問。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發生大革命，要求解放的呼聲瀰漫於全歐。在英國文學史上大抵以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華茲華司（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和考老芮齊（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合著的抒情歌謠（The Lyrical Ballads）為劃分擬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界石。

浪漫主義的詮釋極為廣泛，而其影響亦極悠久。總括此派文學的特色有下列數項：一、描寫神異的事物，後成為超自然主義（Supernaturalism）。二、對於往昔的追懷發生中世紀風尚（Medievalism）。三、愛慕異國的景物產生異國情調（Exoticism）。四、皈依自然。五、要求解放的呼聲。六、對美的渴仰。在這時期中俊秀輩出，就中尤以狂呼解放邁往前進的擺倫（George Gordon, Lord Byron 1788—1824）、佇立塵世要求光明和美的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主張官能的享受而不忘人道主義的箕茨 (John Keats 1795—1821) 爲翹楚。

文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映。十九世紀因科學的進步，物質精神兩方面都生出莫大的變動。所謂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 后時代的文學其中因有心安意得高唱樂天主義的人，然亦不乏因思索許多問題而陷入疑淵的。世紀末的十年前後這種懷疑、煩悶的色彩，更加顯著。這不僅英國是如此，全歐洲幾乎一樣。單論英國，華拉迭 (Michael Faraday 1791—1867) 在一八三一年發見磁電的定律。萊耶爾 (Charles Lyell 1797—1875) 在一八三三年完成他的名著地質學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 一八五九年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刊行種源論 (Origin of Species) 更惹起思想界的波瀾。關於實際問題有亞丹斯密士 (Adam Smith 1723—1790) 的原富，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的人口論，釐卡多 (David Ricardo 1772—1823) 的經濟學等。此外哲學亦有考老芮齊的唯心論和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穆勒 (James Mill 1773—1836) 等的功利說。代表樂天主義的

人物有詩人丁尼孫 (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 和歷史家馬柯列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

丁尼孫可算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國民的喉舌。他的中心思想是不背中庸之道，篤信神的存在，人類進步和靈魂不滅的。一八三二年他刊行兩卷詩集，其中滿載他的佳作。他的友人雖嘖嘖贊賞，而當時的文壇却加以酷評，他憤而閉戶自修，在倫敦賃居樓頂小屋，鑽研不輟。緘默十年，至一八四二年方刊行兩卷詩集，往下酷評者此時亦噤若無聲，全英國奉他爲詩壇第一人。他很知道待時。少時他和一女郎相戀，因家貧不能迎娶，約婚歷十餘年，及至他繼華茲華司爲欽選詩人，領得年金時，才舉行婚禮。這種堅忍前進的性格亦足代表英國的國民性。

馬柯列的評論曾風靡一世，因爲一八三二年議會通過選舉改革案 (The Reform Bill)，中產階級得勢，自由黨漸握政權，物質方面有急激的進展，人多歌誦太平。馬柯列適是一個實際的中庸的思想家，而文筆又犀利無匹，雖其持論祇顧實際的利益，從現在看來不免淺薄之譏，然在當時確與多數人的心理相符合。

他在他所作的彌爾敦論一文中相信詩定隨文明的進步而消滅，頗足代表當時尊重事實的精神。

在另一方面反對淺薄的樂天主義和物質文明之聲甚盛。因當時刊行的種源論認猿爲人類之祖，在這塵世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至於維繫人羣之仁愛等說均屬噬語，於是有對宇宙人生抱懷疑、絕望的態度的詩人。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介紹德國的理想主義以針砭流俗。繼之羅士金（John Ruskin 1819—1900）發揮箕茨的美即真，真即美（Beauty is truth, truth is beauty）之說。詩人兼批評家的安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亦引吭高呼，警告世人不宜忘却生活中最有價值的真善美。此外牛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所領導的揭癰信仰掃除疑霧的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 1837—1843），白朗寧（Robert Browning 1812—1889）的本其所信高瞻遠蹠的抒情詩歌，和由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等七個美術家所組成的滌除拉華耶爾（Raphael 1483—1520）一派的積習，回到拉華

耶爾以前的純樸的情調的「拉華耶爾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等，紛然雜陳。許慈柔拉爾(Edward Fitz Gerald 1809—1883)所譯第十一世紀末葉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Omar Khayyam)的魯拜集(*Rubaiyat*)，充滿『處世若大夢胡爲送其生』的悲嘆。這書於一八五九年出版，其時無人過問。翌年爲羅塞蒂所見大加驚歎，繼由斯溫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白耳登(Richard Burton 1821—1890)推許，便不脛而走，這足證明當時懷疑思想的流行。詩人克那嫵(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說：『他甚麼都疑，乃至對於戀愛。』(Il doutait de tout, même de l'amour) 襲人的夜城 (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的作者托姆森(James Thomson 1834—1882)亦說：『信仰、愛、希望、果真都死了，人還能活下去嗎？』(When Faith and Love and Hope are dead indeed, can Life still live?) 這種絕望愴痛的呼聲不外由上述的背景產生。

所謂維多利亞后時代的文學，大抵以丁尼森去世之年，即一八九二年爲界。

在世紀末的十年前後文壇風氣大變。一部分敏感的青年既不滿意於丁尼森等樂天安命的文學，而因科學所破壞的信仰一時無從建設，關於實際問題如社會主義、社會政策等又囂然塵上，結果對於過去全人類的努力不得不發生根本的疑問。在這時候介紹外國文學之人甚夥。這種風氣倡自卡萊爾介紹德國文學和安諾德讚賞法國文化，而唯美派大師裴德（Walter Pater 1839—1894）亦致力闡揚希臘主義和意、德、法等國的文藝。就中裴德的思想和法國文學二者給與英國世紀末文壇的影響最大。現在試借賽孟慈（Arthur Symonds）對於法國世紀末大詩人魏爾倫（Paul Verlaine 1844—1896）所下的評語來約略襯出英國世紀末文人的根本態度。他的魏爾倫一文結尾說：『外表非常錯雜實是一種偉大的純樸，這點正給魏爾倫的詩以特殊的價值，他讓詩本身總括人性的一切矛盾，尤其總括了柔脆的熱烈的不安定的苦惱着的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時代歷史所未有的這麼多的懷疑、否定、苦悶，彷彿至少是向一個精神的慰安的理想奮鬥着。魏爾倫是這些缺點和這種理想的詩人。』（It is just this apparent compli-

cation of what is really a great simplicity which gives its singular value to the poetry of Verlaine, permitting it to sum up in itself the whole paradox of humanity, and especially the weak, passionate, uncertain, troubled century to which we belong, in which so many doubts, negations, and distresses seem, now more than ever, to be struggling towards at least an ideal of spiritual consolation. Verlaine is the poet of these weaknesses and of that ideal.)

一個人的思想走到絕徑的時候沒有不皇皇然求新路的，那時祇要見到一綫光明就會拼命地追趕，英國世紀末敏感的青年的心情亦是如此。於是異教色彩非常濃厚的裴德所倡的精微的剎那主義撼動了一般青年的心絃。他的傑作之一，文藝復興時代研究，最爲當時青年所寶愛的一部書。據葉慈（Yeats）記他第一次和王爾德（Oscar Wilde 1856—1900）見面的一晚，王爾德向他激賞這部書，說無論旅行到甚麼地方沒有不帶在身邊的。葉慈自己也說『爲尋求我們的哲學我們有意地往裴德的方面走』（We looked consciously to Pa-

ter for our philosophy) 裴德在文藝復興時代研究的結論中已顯然表出他的剎那主義。該書再版時他曾將結論刪去，後來仍然補上。由他註在結論下的話可見它的影響之大。他說：『這篇短短的結論在本書的第二版裏曾省略過，因為我覺得它落到一些青年人的手中或許會引他們向錯路走。但從全體看來，我想最好是將它重印在這裏，略加更改使更近於我的本意。我已將這篇文所暗示的思想更充分地發揮在快樂主義者梅里優思中了。』(This brief "Conclusion" was omitted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is book, as I conceived it might possibly mislead some of those young men into whose hands it might fall. On the whole, I have thought it best to reprint it here, with some slight changes which bring it closer to my original meaning. I have dealt more fully in Marius the Epicurean with the thoughts suggested by it.)

裴德的文章非常駘蕩美妙，讀去使人心悅神怡，這也是撼動青年心絃的一個要素。莫耳 (George Moore 1853—) 在他所著的一個青年的告白 (Con-